

清末民国时期 语文教育观念考察

——以黎锦熙、胡适、叶圣陶为中心

张哲英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考察：以黎锦熙、胡适、叶圣陶为中心/张哲英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34-5504-0

I. ①清… II. ①张… III. ①汉语—教育史—中国—清后期
②汉语—教育史—中国—民国 IV. ①H1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6866 号

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考察

——以黎锦熙、胡适、叶圣陶为中心

张哲英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3752790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58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504-0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序 言

日前接哲英的电子邮件，告诉我他的新著《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考察——以黎锦熙、胡适、叶圣陶为中心》即将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要我作序。阅后甚是欣喜。

哲英是我的硕士，1995~199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攻读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硕士学位，毕业后去厦门集美大学任教。按常人的思维，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能在厦门的高校工作应该是知足了。然而，他却不知足，2006年他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攻读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人们常说“知足常乐”，但对哲英而言，看来他的哲学是“知不足常乐”。这种在求知、求学、做学问道路上孜孜以求，永不满足的精神可喜可嘉。

毫无疑问，哲英的这个研究是属于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我看来，该研究也是属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因为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体系来说，无论是纵向的史的研究还是横向的国外或境外的语文教育研究，它们都是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因此，准确地说，哲英的这个研究属于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我带的学生虽然不算少，硕士、教育硕士100多人，博士20多人，但真正从史的角度研究语文教育，研究语文教育家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为什么呢？因为史的研究又累又苦，光是史料的查阅、考证等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遑论在短时间内发论文，出成果了。因此，在当下学术浮躁，学人急功近利成风的环境下，真正能够沉下心来，甘于坐冷板凳做史的研究的，可以说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哲

英的确是个甘于寂寞，自讨苦吃的人。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从本书的研究看，它既是史的研究，同时又是人的研究。作为人（语文教育家）的研究，作者以黎锦熙、胡适、叶圣陶为中心，同时对现代语文教育史中的一批大师，如夏丏尊、朱自清、陈望道、吕叔湘等，也即作者所说的“共同体”进行研究，并着重研究他们的语文教育观念。这是因为，他们的许多语文教育思想是“共享”的，而非某个人的专利与独创。作者的这些研究无疑会帮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思考我们的语文教育，并从中获得关于语文教育成败得失更深切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语文教育史研究中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对语文教育家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导向，应大力加以提倡。比如顾黄初教授、武玉鹏教授2007年曾合著《探求先辈语文课程教材编制的心路》一文，对百年来为中国语文教育做出过突出贡献和具有重要影响的先辈们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并精选了16位名家的语文教育思想加以考察，以探求我们的先哲关于语文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的心路历程。这些人中，有时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始终坚持在中学和师范语文教学第一线并作出重要贡献的穆济波先生；首开用现代心理学的科学方法来解剖汉字、汉语、汉文的读写规律的艾伟先生；作为近代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文章高手而又关注语文教育，所持论点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梁启超先生；20世纪之初就倾注心力编制新式学堂所需的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蒋维乔先生；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宣传科学的教育教学观念，并亲身付诸践履的徐特立先生；一辈子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科书编制实践，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吴研因先生；在长期从事中学和师范国文教学的基础上，矢志不渝积极探索语文教学规律，并在所编著的教科书和所作的教学演讲中阐述这些规律的夏丏尊先生；“国语运动”早期的中坚，运用先进的教学法理论，结合我国传统的教学法精髓，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读法、话法、作法、书法的规律，其卓

然成大家者黎锦熙先生；用自己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多学科重大成就来观照中学语文教育的课程教材建设，并提出诸多创见，在影响和推动整个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功不可没的胡适先生；作为儿童心理学在中国的奠基人，潜心于中国汉字的科学统计和儿童国语教科书的编纂和实践研究，影响至巨的陈鹤琴先生；终其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其语文教育思想和在语文课程教材建设中的实绩影响了几代人，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叶圣陶先生；大学毕业后就在7所中学和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达五年之久，根据这五年的教学实践，写出了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篇综论中学国文教育内外诸种矛盾问题的长篇论文，此后即使在大学任教也仍关心着中学的语文教学，集诗人、学者、斗士于一身的朱自清先生；由一个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转而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每有析论，往往高屋建瓴，启人心扉的“开明派”主将之一的吕叔湘先生；从延安窑洞里走出来的语文教育家，竭力主张“文从说话起”的辛安亭先生；从研究现代语言学开始，进而调查当代语文教育现状和传统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总的目标是努力探寻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的张志公先生。

又如福建师范大学的潘新和教授，2008年他的专著《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就对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四位语文大师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反思，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充满了深刻的学术理性和时代批判精神。

再如衢州学院的周纪焕老师发现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现代作家与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如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沈从文、曹禺、郁达夫、叶圣陶、朱自清、赵树理、闻一多、何其芳、刘大白、刘半农、周作人、林语堂、柔石、李广田，等等，他们都或短或长地担任过中小学语文教师或曾在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有的甚至以此为归宿，认为这是20世纪一道瑰丽的文化风景。因此，他也对这些名家的语文教育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

当然，哲英的研究与上述研究虽有方向上的一致性，但研究思路又有其独特性。尤其是作为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他以语言与文学的发展为线索，较为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语文教育兴替的简明史，能给人以启发。我们当代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失误，发生的诸多争论，细究起来其实都与我们对近代以来的语文教育缺乏了解有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能从语言这条线索清晰梳理出我国语文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对我们纠正当下语文教学中轻视甚至忽视语文知识教学的倾向极富启发性。如果从1892年厦门人卢懋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算起，它联系着清末下层的启蒙运动，经切音字运动、拼音化运动、国语改革、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等不断发展……半个多世纪中似乎没有哪个语文课程文件不重视语文知识的。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从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历经50年代中期“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确立，到60年代初期《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强调“双基”，提出了语文“工具性”问题，再到90年代初期义务教育大纲强调知识点和能力训练等（其间的“文化大革命”除外），证明“国语运动”所形成的语文教育观念的延续是一贯的（尽管这中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

然而我们当前的语文教学实践却存在着去知识化的倾向，这与新课程提倡“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不无关系。许多语文教师不无感慨地说：从2001年实施语文新课程至今已有9年多了，但我们的师生至今仍不清楚语文课程应该有哪些知识，更不用说如何掌握它了。关于语文知识，大家不赞成原有的语文课程原封不动地照搬语言学、修辞学、文学等知识，因为事实证明，照搬这些知识并不能有效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言语实践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文课程没有知识或不需要知识。从课程论的角度看，我们对语文知识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加以回避，因为任何一门成熟的课程都不可能没有知识。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要不要语文知识，而是需要建构什么样的语文知识。从根本上说，语文知识是人类语文实践在人们头脑中反映，是人

类的认识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如果说知识是人的智力活动的一种“物化”，那么人的实践则是这种“物化”的唯一源泉。学生之所以需要学习语文知识，是因为它能够正确指导他们具体的语文实践。这种指导作用，正是人的智力的体现。

最后我想说的是，即使是现代语文教育史，它研究的毕竟仍然属于“传统”的范畴，所以必须认识传统与今天创新的关系。这几年，我们的语文教育大概太多地关注于“创新”，太多地急于去“创造”，所以许多优秀的传统，包括近现代以来许多优秀的语文教育思想等开始被人逐渐淡忘。但事实上，真正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它可以被人们淡忘一时，但决不可能永远淡出语文教育。即便是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改革也决不可能绕开它们，另砌炉灶。这是因为，语文教育及其研究是不可能割断历史和传统的。换一句话说，尽管时代不同了，环境变化了，但只要你搞语文教育，只要你搞语文教育研究，那么你就无法回避、无法绕开 20 世纪这些大师的语文教育思想。当然，我们敬畏大师，并不是迷信大师。因此，对语文教育，对语文教育研究的态度，我们不光需要人文和激情，而且同样需要科学和理性。

倪文锦

2010. 12. 19

目 录

研究综述	1
一、研究意义	1
二、研究现状分析	9
三、研究方法	15
四、研究结构	16
第一章 现代语文教育家的“观念前在”	17
一、传统教育中的“语文意识”	17
二、《癸卯学制》颁布前的语文教育实践	23
三、《癸卯学制》颁布以后的“制度化过程”	30
四、现代教育观念与语文教育	40
第二章 “工具”的语文教育观——以黎锦熙为中心	50
一、卢慧章与国语运动	50
二、重视文法	69
三、《新著国语教学法》与国语教育观念	88
第三章 “自由”的语文教育观——以胡适为中心	101
一、自由发表思想	102
二、理想的语文教育观	130
三、语文教育逐渐纳入现代教育系统	152

第四章 “工具”与“立诚”兼具的语文教育观——以叶圣陶为中心（上）	171
一、如何研究叶圣陶	171
二、修辞立其诚	191
第五章 “工具”与“立诚”兼具的语文教育观——以叶圣陶为中心（下）	216
一、语文习惯的养成	216
二、从“暗里摸索”到“明里探讨”：以文章学为基础	225
第六章 现代语文教育观念形成进程中的几对关系	248
一、“教育”的白话文与“文艺”的白话文	249
二、教育与生活相互贯通	251
三、人文学者兼济现代语文教育	253
四、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对传统教育的“眷恋”	255
五、20世纪语文教育的“前半期”对“后半期”的影响	257
附录	264
附录一：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目录	264
附录二：胡适为青年学生开列的书目	267
附录三：叶圣陶语文教育著作情况	269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记	287

研究综述

一、研究意义

在中国百年语文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既内在地存在着由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的转变，也外在地遭遇着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然而，无论是就其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而言，还是就所需资源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却往往是后者。对于现代语文教育而言，东方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的“冲突”有着更为剧烈的表现，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问题。首先，观念上的冲突。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的文化背景下，语文教育是面向经典——文以载道，还是面向人的生活本身。其次，培养对象的转变。在现代语文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社会较为普遍的“贵族教育”势必要被“平民教育”或“国民教育”所代替。这极大地塑造了现代语文教育的新面孔——从文言向白话的转移，从书院到学堂的转移，从《文心雕龙》到《文章作法》的转移，亦即从语文素养到语文能力的转移。第三，话语体系上的失调。主要缘于在“戊戌维新”时期高度重视教育在富国强民方面的卓越功能，加之西方教育学理论（最初主要由日本引入）的影响，现代的教育活动逐渐从综合的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在无意识的状态中，这种独立也逐渐摆脱了传统教育中“道”与“教”统一，“文”与“教”统一的模式。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语文教育如何以及能否从“经国之大业”

转向一门普通“培育国民”的课程，尽到“自己的任务”，实现“语文课要教得像语文课”的愿望。然而，就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的不顺利，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患了“失语症”。绝大多数的语文教育改革都是一味地去“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从而忽略了对古典语文教育资源的继承和弘扬。由东方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冲突”转化而来的这三个问题，显然在社会生活日趋丰富的今天还没有完全彻底地被解决，甚至问题本身还变得越来越复杂。

本研究旨在考察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的形成、发展和流变，因此如何提炼出这个时期语文教育的核心观念无疑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豪舍尔说：“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①对于现代语文教育观念而言，有两个比较大的语文运动势必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它影响着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基本发展方向和特点。这两个语文运动就是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国语运动联系着清末的下层启蒙运动，历经切音字运动、拼音化运动、国语改革、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等；新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胡适为先锋、鲁迅为主将、陈独秀为领袖，以《新青年》为阵地，期望以文学改革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在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后，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合流。现代语文教育的核心观念就是在这两个语文运动中逐步形成并获得深入发展的。例如，重视现代语文知识的建设，强调语法学知识对语文教育作用，彰显“工具”语文教育观念，就是在国语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再例如，倡导“自由发表思想”，运用“活”的教学法，彰显“自由”语文教育观念，就是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又例如，强调

^① [英] 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5页。

“修辞立其诚”，重视“语文习惯的养成”，彰显“德”与“行”语文教育观念，既体现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成果，也体现了现代语文教育与传统语文教育之间的血缘关系，无疑体现为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的丰富和深入发展。主要由两大语文运动所形成的现代语文教育观念，其历史穿透力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基于“工具”语文教育观念在解放初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在1955年实行“语言文学分科”实验中，人民教育出版社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汉语教学的基础。到了60年代初经济恢复时期，《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强调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从而形成了语文学科“工具性”的问题域，也成为当代语文教育改革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自由”语文教育观念，其命运不如前者那样顺利，50年代的“语言文学”分科毕竟是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的产物，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未有太多的联系。由于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时光一直跨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北京文艺》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导致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纷纷加入到语文教育改革的队伍中来。至此，当代语文教育变革才真正接上了“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一缘脉。

观念的形成与人的实践性格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杜威所说：“就‘行动’一词字面上和存在上的意义而论，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就是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去接受从外面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感觉。”^①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语文教育家，他们的思想与实践在很大的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因此，如果能够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语文教育家进行研究，显然会使我们较为准确地“触摸”到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律动。

对于叶圣陶语文教育观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代语文教育领域研究

^① [美] 杜威著、傅统先译：《确定性的追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的“热点”。由于叶圣陶在现、当代语文教育领域里的重要贡献，以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占的重要社会位置等原因，导致许多学者将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几乎等同于现代语文教育思想。这样的研究必然造成至少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将叶圣陶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隔离开来。事实上，叶圣陶的众多朋友和同仁都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如夏丏尊、朱自清、陈望道、吕叔湘等等，叶圣陶们的许多语文教育思想是“共享”的，是“共同体”的产物，而非某个人的专利与独创。如叶圣陶在《叶圣陶集》编辑过程中所说，有许多文章实在分不清是他的观点还是夏丏尊的观点。因此，当我们接触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时，就应不自觉地把它和叶圣陶周围乃至同时代其他语文教育家的思想相互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二是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当成了“源”，而不是当成“流”。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形成了对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顶礼膜拜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使得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沦为现实需求的“奴婢”。从1980年《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出版，吕叔湘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归为“工具性”以来，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着。如此一来已经丧失了研究的独立意义，这种研究已经沦为“六经注我”的变型。叶圣陶及其所处时代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至少是我们前面所提到“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离开了“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来讨论叶圣陶及其所处时代的语文教育思想，就会陷入“符号化”和“空洞化”的境地。例如叶圣陶强调“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清末民初“自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在著名教育家俞子夷看来，那就是赫尔巴特教学思想的“翻版”和“改进”。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叶圣陶的这个观点与我们今天强调自主学习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很多语文教育工作者都深深折服叶圣陶“语文教育应当和生活密切关联”，其实这里“生活”一词的意义该是多么丰富啊！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要面向生活，而后者要面向经典，“面向生活”也就是极大地具有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色彩和特点。加之叶圣陶早期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并创

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包括童话在内），都为“生活”一词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要理解和把握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就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选择了胡适这位重要的现代历史人物。胡适是他所处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语文教育家。黎锦熙、胡适和叶圣陶都是同时代人，然而就他们在现代语文教育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而言，似乎可以属于前后不同的三个阶段。由于新文学运动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叶圣陶与胡适曾经有密切的交往，并在胡适的审定下与顾颉刚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以及起草初中国文课程标准等，然而叶圣陶毕竟是在1932年编写完《文心》一书以后，才把精力集中到语文教育的研究上来。新文学运动期间，胡适在现代语文教育领域发挥影响的方式是独特的，既有宏观方面的，又有现实具体的。胡适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暴得大名”，其后被陈独秀“逼上梁山”，誉为“文学革命的总先锋”，然而其影响绝不会限于文学领域。在“垂文而治”社会里，文学革命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思想革命。在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逐渐问世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迅速遍及开来。这场思想革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并且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也影响了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勿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可以说，“八事”无一不是语文观念的问题，无一不和语文教育观念密切相关。胡适的两篇论文《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可以看作是全面而具体的现代语文教育理论。文中的许多主张都落实到了语文教育实践中，并影响到了其后1922年“新学制”之“国语科课程标准”。“自由地发表思想”成为现代语文教育的最高价值观，讨论法、演讲法成为当时语文教育中最时尚和流行的教学方法。

如果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叶圣陶和胡适那里，我们所获得的对于现代语文教育观念形成与发展的认识，恐怕与历史本真还有一定的差距。现代语文教

育观念在发端时期的动力因素决定了其基本面貌，并被打上了独有的“底色”。这个“底色”将难以遮盖，只要我们将其后的改革归为“现代语文教育”这个时段的行动。显然，新文学运动不能成为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底色”。从文化变革的动因看，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外在文化压迫形势下的产物，这种情势造成其自身因救亡运动而推动启蒙运动的特点。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底色”源自于清末下层启蒙中的“国语运动”，国语与国语运动是现代国家救亡图强的产物，其特征是倡导语文教育的“工具”作用。在这个运动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人物，如卢懋章、王照、吴稚晖、钱玄同、黎锦熙等等。但最终能与这场运动相伴最远及富有成果的人物则是黎锦熙。可以说《新著国语法》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奠定了他在语文现代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新著国语教学法》则奠定了他在“国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也由于他在“国语统一研究会”中的重要影响，黎锦熙当之无愧成为“国语运动”的代表人物，成为考察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中心人物。“国语运动”开展较早，但真正落实于教育中，则是“新文学运动”领袖们的功劳。

基于“现实问题”方面的理由来探讨三位现代语文教育家的语文教育观，实际上又反映了20世纪“前五十年”语文教育观念演变的基本面貌。因此，本研究也将促进现代语文教育史研究的深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黎锦熙、胡适、叶圣陶三位语文教育先行者在现代语文教育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个人的影响毕竟是有限度的，因此那些“非中心”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观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所重视。本研究在主要介绍与阐释三位先行者的语文教育观时，也要介绍一些“边缘一点的”语文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改革者。这样做的结果，相信既使得问题的阐述显得更为全面，也会产生对照的效果。

在考察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的产生、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本研究还期望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些许进展。

首先，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虽然我们承认“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

观念”中的“清末民国时期”绝不仅仅是表示一段物理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体现为追求一种新观点和新方法的过程，如胡适提倡文学“八事”，将新文学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周作人强调“人的文学”，就此而言，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但还有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因而我们不想以“现代性”来过早地“框定”这一段时期语文教育观念的性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①这是对内发型现代化的一种分析，对于我国以及本研究所要探讨的语文教育观念而言却不尽然。就历史发展进程看，清末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观念既没有完全做到“自由发表思想”（胡适语），也未充分实现“科学化”，这些结果都需要结合我国的教育传统做认真和具体的探究。本研究没有设定“现代语文教育观念考察”这类题目（或研究对象），而名之以“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考察”，就是要给我国语文教育观念“现代性”的探讨预留下足够的空间。李欧梵说：“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多种的现代性，那么事实上理论上是不能被架空的。要借助比较扎实的史料进行研究和思考，或是多种文体的比较，或是多种资料的累积，慢慢呈现出现代性发展的面貌。”^②这无异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论。

其次，语文教育观念与文化运动的互动研究。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观念，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观念，可以看作是文化运动“细节”或“微观”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如果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显然会对文化运动的研究起到丰富和深化的作用。例如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引入和传播，促进了国内的教育教学改革，在当时比较著名的教育实验有道尔顿实验室制和设计教学法改革实践等，但是由于诸多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都以失败而告终。这隐隐地告诉我们新文化要想在中国教育领域

①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著：《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 李欧梵讲演：《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包括语文教育)扎下根来,还需要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从另一方面看,文化运动的研究也会促进语文教育观念的研究。语文教育观念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制于文化价值观念的更迭。例如,“工具”语文教育观念形成于国语运动,而国语运动自身就是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字以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①实际情况是举国悲痛——从士子到平民。其后下层启蒙运动渐渐萌起,白话报刊方兴未艾。如果追溯“国语运动”的萌芽,在时间上还要提早很多。卢懋章在19世纪80年代认为:“求学期于济世,寻章摘句胡为者?今日欲救中国非普及教育不可;欲普及教育非易识字不可;欲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历经十几年的努力,最终在1892年写出切音专著《一目了然初阶》。此书两旁对联云:“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可以说,语文教育观念的兴起与发展实在是社会文化运动需求的反映,了解了社会文化运动,才能真正把握语文教育观念的内在意义。

第三,“语文教育百年”研究与“教育学百年”研究之间的相互映照。几乎自1901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翻译日人立花铣三郎所著《教育学》起,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产生了,并成为教育学史上的世纪难题。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本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现代西方教育学与中国传统教育实践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型态。就问题的另一方面而言,相信绝对不是历史上的巧合,语文教育的百年问题也就此产生。当语文教育在客观上不断地“教育学化”,即越来越适合于现代教育制度的特点(有较强的西方文化特点),其自身所面临的争议却持续不断。仅就语文教育而言,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忽略了在教育学“中国化”之前先要“化中国教

^①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530页。